



中国 教育 科研 参考

2021 年第 24 期

总第 (514) 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21 年 12 月 30 日

目 录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百年的发展脉络、历史经验与未来走向	王定华 王名扬 (02)
中国共产党发展高等教育的百年历程、成就与展望.....	郑庆全 杨慷慨 (10)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与经验启示	闻德亮 丁 宁 (17)
建党百年之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建设回望.....	李 芒 石君齐 (26)

编者的话: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稳步迈进。今天,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在这个重要关口,厘清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高等教育发展脉络,总结历史实践经验,把握未来前进方向,全面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势在必行。本刊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为选题,集中选编若干文章,供读者参阅。

主编:王小梅 本期执行主编:王者鹤 责任编辑:李 璐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5号世宁大厦二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编:100191 电话:(010) 82289239
电子信箱: gaoyanbianjibu@163.com
网址: www.cahe.edu.cn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动态栏目)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

百年的发展脉络、历史经验与未来走向

王定华 王名扬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百年来，党领导高等教育的创立与发展始终与国家共命运、与时代同脉搏、与人民共相依。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地位在高等学校的办学实践中得以确立，形成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从阶级教育到革命教育、到国民教育、再到现代教育，党领导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实现了关键性历史变革，极大地丰富了政党领导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从革命时期的艰苦卓绝到建国时期的百废待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轰轰烈烈、改革开放时期的鼎新革故、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民族复兴，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肩负的使命重任决定了其领导高等教育方向的客观需要。今天，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高等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两个源头，一是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模式，二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创办的高等学校。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高等教育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教会学校、私立学校不断衰败消亡，党领导的高等学校持续焕发生机活力。一百年来，党领导高等教育创立与发展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建党初期自主设立高等学校的初步创办阶段（1921—1937年）

1. 于混乱中发轫：建党初期创办的高等学校。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内工农运动兴起，新民主主义革命潮流高涨。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自主创办高等教育具有启蒙作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革命方针，指导高等教育创办实际的、具体的理论与教学活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也成为发展

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活动的迫切需要。“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发现真理、造就人才”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方针。

湖南自修大学于1921年8月在长沙创办，是第一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大学。它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通过将学习、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为党培养了一批工农运动领导骨干。上海大学于1922年10月改组，是第一所培养高级干部的学校，旨在培养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和建设新文艺的革命人才，在课程设置方面既注重学生的学科基础知识传授，又非常注重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

2. 于探索中拓展：苏维埃根据地创办的高等学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党在这一时期实施苏维埃教育，确立了“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文化教育总方针，创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红色通讯学校、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等高等教育机构。

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于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创办，是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央高级党校。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将其改称为中央党校，旨在培养革命政治工作干部。红军大学于1936年由工农红军学校更名而来，是培养训练红军高、中级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确立了“实事求是、团结友爱、艰苦紧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校训。苏维埃大学于1933年9月在瑞金建立，次年与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合并，旨在为苏维埃建设培养各方面的高级干部。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干部学校标志着党探索新型高等教育实践的滥觞。

（二）革命战争时期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积极扩张阶段（1937—1949年）

1. 于危难中转型：抗日革命根据地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制定了“实行抗战的教育方针，提倡国防教育，实行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力发展工农群众的教育”。为培养更多的抗日干部和各种建设人才，党在陕甘宁边区、华北抗日前线陆续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30余所新型高等学校，每所高校各有定位，分工合作，错位发展，各扬其长。

抗战时期党创办的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十分重要。首先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运用于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发展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其次是延安的高等学校逐步向正规化和专门化方向发展，“延安模式”显现。最后是培养造就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干部队伍志存高远、信仰坚定、德才兼备、廉洁奉公，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2. 于内战中重建：解放区创办的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1940年初，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从抗战胜利后到解放战争爆发前，晋察冀解放区积极开展学校教育正规化的探索，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和制度得以实施和发展，初步实现了“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向“教育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建设服务”的转变。解放战争爆发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得以坚持，强调教育为解放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和实际生活相联系。解放战争后期，党确立了“教育需要向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正规化’方向发展”的教育方针，对华北解放区的高等学校进行了整合、重组，高等教育向革命化、专业化方向又迈出一步。全国解放之际，为全面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实行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和完整的学校教育制度成为必需。这一时期，北

方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东北军政大学等14所专业学院的组建，拉开了党建立统一高等教育制度的序幕。

研究发现，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解放区高等教育始终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着重于战后的恢复与重建。抗战胜利后，党积极实践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进行城市稳定、正规化办学的尝试；解放区战争时期，党坚持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新要求，以培养“自己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目的”，将解放区原有的许多高等学校、学科和专业进行正规化改造，东北解放区高等教育建设是解放区高等教育改革的突出代表。这些历史进程都为新中国创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改造阶段（1949—1978年）

1. 于接管后整顿：建国初期以“苏联模式”改造高等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领导教育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快速整顿国家教育的旧象乱局、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教育事业。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在弘扬解放区高等干部教育的同时，党接收改造国统区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改造、调整、整合、组建，形成了全国范围的高等教育体系。

在教育制度方面，对旧大学的改造成为我国学习“苏联模式”高等教育的开端。1949年我国高等学校由公立、私立、教会大学三种类型构成。共有公立高等学校124所（包括国民政府国立、省立、市立学校）占总数的60.5%；私立高等学校61所，占29.8%；教会高等学校21所，占9.7%。针对当时高等学校类型多样、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党开始推广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通过改造和裁撤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全部收归国有，实现对旧高等学校的改造。1952年秋，以苏联模式为模板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全面铺开。此外，党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对高校原有政治课程进行改造：

一方面“破旧”，取消三民主义、训育原理、军事训练等课程；另一方面“立新”，全面学习苏联高校政治理论课程体系。1953年，党基本肃清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在高等教育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地位。此外，教学上还着重发展科学与技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着力适应工业、国防需要。

2. 于改造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院系调整中的高等教育。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党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为满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展开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大事，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经历了4个阶段，即1949年底至1950年底以京津沪为主的小范围调整阶段、1951年底至1952年底的全国院系大调整阶段、1953年5月至1953年底以中南区为重点的继续调整阶段、1955年至1957年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高校布局补充调整阶段。这一时期的院系调整力度大、影响广、动作快，对当时整合力量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益的，但也让部分高校后来长时期一蹶不振。这一时期，为提高地方办大学的积极性，高等教育管理权由中央下放至地方。1958年4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指出“除少数综合性大学、某些专业学院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仍由中央教育部或中央有关部门直接领导外，其他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都可以下放，归各省、市、自治区领导。”1958年9月起，高等教育经历3年“大跃进”，盲目扩张造成了高等教育布局失衡、教育质量下滑等问题，高等教育面临再次调整。1961年，教育部多次召开高等教育调整工作会议，对高校的规模和布局进行“瘦身”。首先，大幅度缩减高校数量；其次，定发展规划、定学制、定专业、定人员编制；再次，全国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从627个降至373个。

3. 于动乱中停滞：“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高等教育。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

始，高校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党对高校的领导遭到严重破坏，高等教育发展停滞，人才培养遭受重创。高等教育在院校规模与布局、学科专业设置、领导体制、招生标准、课程教学等方面均受到严重冲击。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从此我国高等教育面貌一新。

回望新中国成立之后，党迅速接收旧大学，并对高校进行全面改造，肃清高校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切反动因素，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初步构建了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这一时期，党在高校建立起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高等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高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大学建设与发展受到伤害。虽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高等教育在模仿和探索中曲折前进，但高等教育总体上还是发展的，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急需的人力资本。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改革探索阶段（1978—2012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这一时期，党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1999年，党中央决定进行高校大扩招，全国高等教育得以跨越式发展，实现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

改革开放使我国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变化，高等教育体制必然随之进行改革。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单一管理体制，曾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过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显现，高校缺乏自主办学活力。1992年11月，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召开，国家教委指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高等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有机统一起来”“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改革高等教育体制”。1993年党中央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20世纪90年代深化教育改革提供了指南。

世纪之交，党两手抓高等教育，在规模上、质量上同时发力。一方面，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1999年，国家实行高校扩招政策，使更多的个体享受到高等教育资源，满足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人才规模的需求。“截至2002年秋季，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已达1600万人，比1998年翻了一番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15%，历史性地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另一方面，重点大学项目积极推进。1995年11月我国启动了“211工程”，1999年启动了“985工程”，这两项教育领域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提高了我国一大批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内涵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做出了全面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跨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等重大战略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调研，发表重要讲话，还先后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籍专家伊莎白颁发共和国友谊勋章，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给北京科技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回信，提出殷切期望，做出明确指示。在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2019年3月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阐述了“高等学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特别是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教育改革必须做到“九个坚持”，并对高等教育内涵式、特色化发展和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进行了深刻阐述，号召高等教育发展要同党和国家现实目标、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

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新时代，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截至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738所，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18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4.4%。在规模扩张同时，强调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着眼点。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高等教育。在革命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党的教育理念发生了从阶级教育、革命教育、国民教育到现代教育的转变，高等教育制度也经历了独自摸索、延安模式、苏联模式、新型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等阶段。全面回顾党领导和创立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深入总结党探索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规律，有助于新时代更好地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篇章。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保证，其确立和完善既有对中国共产党精神理念的移植，又有结合时代背景对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的独创改革。

党的全面领导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事业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做好高等教育工作最宝贵经验和最为强大的发展动力。只有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才能把握好我国教育的正确发展方向，这也

是我们办好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的最大政治优势。

（二）党的机构是党领导高等教育的组织保障

党的领导是引领新时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核心是要处理好党、政、学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在此基础上，通过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实现各利益主体的有机协同，形成党委领导、多方参与、学术自治的高等教育的有效治理机制。党的领导融入大学治理结构之中，需要形成系统化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化的运行模式。大学党组织系统在机构设置上分为校级层面和基层组织：校级层面设有党委及其办事机构；基层党组织设在院系、教研室、研究所等机构。同时，大学建立起一套民主监督制度加强党的领导。如通过党代会、常委会、党政联席会、支部会等形式行使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权与监督权。这些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保障了党对高等教育的统一领导，有助于将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大学的每个角落，提升治理效能。

（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校治理的现实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党确立了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权。直至今日，高等学校内部领导体制共经历了7次调整：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同时试行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外，每次领导体制的调整都发挥了相应作用，并且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改进。

高等教育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机制也因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而逐步确立、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五章第三十三条规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做出决定，同时保证行政领导人充

分行使自己的职权。”2010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三章第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按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院（系）级单位党组织，通过党政联席会，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要事项”。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章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201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一章第九条规定，“民办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开展党的活动，加强党的建设。”可见，根据多次修订后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被实践证明的可行的现实选择。

（四）马克思主义是党领导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创办高等教育的思想前提。在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发挥了启蒙、推动、调整和支撑等作用。建党初期，具有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最先倡导创办高等教育。革命战争时期，党通过创办刊物、邀请社会名人和进步人士到高校讲演、开展学生社团活动等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高校的开展，奠定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广泛宣传和高校党组织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

导权，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是保障党领导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历史证明，高校的改革创新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有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党的教育政策和方针才能够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五）以人民为中心是党领导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

无论是为人民服务的高等教育，还是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都是强调高等教育的人民理念、人民立场，都是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党初期，以“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发现真理、造就人才”为教育总方针，我们党开启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制定了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劳动群众相联系的教育总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高等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明确了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先后做出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高等教育强国的重大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发展更加强调为人民服务。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扎根人民，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双一流”建设、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深化教育

对外开放，都是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实现教育强国的有效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努力做到高考机会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加快“双一流”建设，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将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作为党领导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发力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还要深化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支持为学生成人成才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

（六）理论联系实际是党领导高等教育的教育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党领导高等教育百年发展历程中最首要的教育原则和最有效的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贯穿于党领导高等教育创立与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虽然在不同时期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不同，但共性在于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和战争知识教育、军事战略战术教育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建党初期，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任务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措施。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创办新型高等院校确立起学用一致、学以致用、学以致用的办学导向，纠正了过去教学中存在的一些不注重实质而注重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做法，以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弊病，让学生领会马列主义实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成为党培养干部的重要思想路线，这反映出高校教学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实际问题。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体现。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

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办好中国的教育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他国经验，苏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并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去引领，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去滋养培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方案。

（七）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党领导高等教育的使命担当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的创办与发展具有鲜明的使命意识，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与时代同发展，为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中心工作服务，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这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最鲜亮的底色。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这是百年实践所证明的正确道路。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高等教育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高等学校不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相关内容，深化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认识，教会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为学生成长成才打下科学的思想基础。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之才。同时，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从更高站位、更宽平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

建党百年，经过艰苦卓绝岁月和砥砺奋进实践，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走过了从小到大、由弱变

强的辉煌历史历程，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转折，在经历了大改革、大发展后迈入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阶段。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教育事业站在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正在开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立足“十四五”，面向2035，必须把党的最新战略部署转化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中国共产党创办和发展的新型高等教育有着独特的性质、路径和方向，为中国近代以来始终无法解决的大学本土化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对开创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未来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宝贵经验，对高等教育发展更加自信，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砥砺前行。

（一）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全面领导

以建党百年为契机，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遵循，把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落实到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不断优化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使之更加有效和顺畅。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高校各项工作的固本之举，善于运用一切场合、载体、方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感染力和时效性；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把抓好基层党建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障，不断夯实基层党建，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师生最贴心、最信赖的组织依靠，成为教书育人的坚强战斗堡垒。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作为常抓不懈的政治任务，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

育的根本任务，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等方面下功夫。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应该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面向未来，立德树人重点必须放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我们的教育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做到育人和育才相统一。

（三）推进“双一流”建设重大战略，提高高等教育教学科研质量

领导我国高等教育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党的重要使命。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办好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应当面对中国问题，处理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高等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应当服务中国发展，在中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全球尖端领域竞争加剧的环境中，办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应当塑造中国特色大学精神，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办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等教育。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手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高等学校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内涵式发展、改革驱动，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着力点，在锤炼特色、深化改革、服务需求中加快建设，培养高端国际化人才，不断深化国际实质性合作，主动融入国家软实力建设，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坚持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相结合，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使命。

（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高等教育创新服务能力

面向未来，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成为大

学更加重要的功能，也将是一所大学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放眼全球，机遇和挑战长期并存；立足国内，创新和发展更加迫切；环顾左右，协同和竞争相互交织；面向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深加广。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面对高等教育激烈竞争，面临人工智能巨大挑战，必须不断创新，抢占发展先机。以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在机制上求得突破，强化教育评价导向。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性，改革教师评价和学科评估，加大教育教学改革的力度，放手让各类改革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啃下教育评价这块“硬骨头”。要按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破除“五唯”，破中有立，破立结合。在党的领导下，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应当对内聚焦、对外扫描、准确思辨，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确立新发展格局，服务国家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建党百年，党领导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走过了光辉历程。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各高等学校都应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要求，坚定不移践行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忘初心、勇担使命，脚踏实地、再创佳绩。

（王定华，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北京 100089；王名扬，通讯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北京 100089）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6期）

中国共产党发展高等教育的 百年历程、成就与展望

郑庆全 杨慷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一项战略性工作，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也是其领导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不断取得成就的一百年。当前我国处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回顾党发展高等教育的百年历程，谋划与展望未来，对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发展高等教育的百年回顾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一些学者从多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如顾明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之时，总结提炼了党领导新民主主义教育和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本质和核心，对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确定和新时代的今天及以后的高等教育发展定位给出了有力阐释；朱永新从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教育发展的显著成就，指出其最突出的成就是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张晓萌、韩喜平等分别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生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陆有铨在《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中指出，在20世纪百年教育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后的特殊时期对高等教育的正规化、专业化的整顿和改造，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刘振天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之匹配的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在转型阶段的发展实现了从内涵到外延的价值革命。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旨在为更好地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做铺垫。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有不同的研究重点。金鑫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的

历史角度出发梳理并分析了党在育人、社会服务和引领文化方面的三大优势，得出中国共产党必将领导高等教育发展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这一基本结论；李宏刚等将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划分为改造、创建、大众化和普及化4个阶段。笔者认为，根据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所处地位的不同以及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可以将建党百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大致分为“新中国建立前的探索期”“过渡转折的奠基期”“改革发展的优化期”与“实力强化的提升期”4个时期。

（一）新中国建立前的探索期（1921~1948年）

大学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孕育中国共产党的场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大多来自大学。因此，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并在投身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形成了具有典型特色的根据地革命教育思想。我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除进行政治、经济的革命与建设外，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进行了若干新的尝试，形成了以毛泽东、徐特立、吴玉章等为代表的革命教育思想”。“从徐特立先后创办的列宁师范、鲁迅师范和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等院校来看，就在学制、招生、课程、教学等方面，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办学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适应根据地和解放区革命与建设需要的创举”。为适应革命战争对革命干部的需要，根据地和解放区依据“干部教育第一”的原则，先后创办了红军大学、延安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高校，以及适应各部门需要的干部培训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工农干部的知识化，大批知识青年由此成长为革命干部。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奠定了今天高等

教育发展的特色基础，也为新中国积累了兴办高等教育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办学实践形成了“延安模式”，对高等教育发展中国道路的开创、中国模式的形成具有重大价值。

（二）过渡转折的奠基期（1949~1977年）

处于过渡转折中的奠基期又分为1949~1965年和1966~1976年两个阶段。1949年以后，我国改造了原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并学习苏联模式，尝试构建新型的高等教育体系。“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为此我国在这一阶段组织了大规模扫盲运动，创立多所工农速成中学，选拔优秀工人和农民上大学。1957年我国仿效苏联模式调整了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加强了综合大学建设，并发展了专门学院。1958年的“教育革命”对高等教育办学体系、管理体制与教育教学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但也导致了高等教育规模过度扩张。1961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高校教育质量有所提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的办学经验与基本规律，出台了具有开创意义的“高教六十条”。

1966~1976年，我国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高校数量下降严重。高校招生取消了文化考试，实行以“政治思想”为主要标准的“推荐入学制度”，这一违背办学规律的制度带来的是高等教育质量的大幅下降和人才断层，对国家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1977年党和国家果断恢复统一高考制度，我国高等教育得以重回正常发展道路。

（三）改革发展的优化期（1978~2015年）

统一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得到加速发展，在规模与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978~1992年，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教育体制改革措施，通过修订本专科专业目录、实施三级办学体制、增加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招生就业制度等，使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得到恢复并逐步

正规化。1992年到1999年，党中央通过尝试市场化改革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如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高等学校、收费并轨、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以及出台《高等教育法》等，旨在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到1998年，我国研究生在校人数由1978年的10934人增加到198885人，扩大了18.2倍，招生人数由1978年的10708人增加到72508人，扩大了6.8倍。此后，我国先后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与《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确定将“调整结构、规模与形式”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重点内容。在21世纪前10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的年增长率保持在20%左右，并在2008年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在此期间，我国还开展了全国性的本科教学评估，实施“质量工程”，持续推进高等教育发展。这一阶段高校规模不断扩大，质量得到大幅提升，管理体制的改革获得质的飞跃，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进入新阶段。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从完善人才培养标准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9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标志着以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为内核的“双创”教育成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的主要突破口。同年，教育部等三部委出台《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地方本科院校开始实行产学研结合，注重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逐步增强。

（四）实力强化的提升期（2016年至今）

2015年11月，《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出台，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规划。《方案》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7年，教育部等部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正式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央提出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强调大学要立足中国国情、继承中国传统、面对中国问题、服务中国发展、塑造中国特色大学精神。

这一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得到很大提升：一是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高校数量在2019年达到2688所，研究生培养机构达828个，全国各类高校在学人数突破40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高等教育规模与研究生招生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二是依法治教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如《高等教育法》得到进一步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扩大；绝大部分高校都制定了《大学章程》，完善了内部治理结构。三是逐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形成了教育“政府管、学校办、社会评”的互动生态。四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增强。到2016年底，我国先后与多个国家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拥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2480个，在14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100余个本科以上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发展取得的历史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曲折发展过程，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教育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层次与质量不断提升，高校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智力之源”

首先是人才培养规模实现了巨幅增长。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逐步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招生人数与毕业生人数大幅增长。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1949年的30573人扩大到2019年的914.90万人，毕业生人数从21353人增长到758.53万人，分别增长298.3与354.2倍。

其次是人才培养质量大幅提升。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将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邓小平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同年他在全国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从严要求，大力提高教育质量。”1987年，原国家教委组织了教学质量评估试点工作，1988年又出台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的意见》，1990年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并将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评估写进了《高等教育法》。从2016年开始，教育部每年发布《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全方位展现并跟踪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状况，中国高等教育转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学生的满意度不断提高。百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是建立了完整的学位体系，提升了人才培养层次，特别是研究生数量与类型持续增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学校1949年招收研究生数仅为242人，到2019年我国研究生招生数达到91.65万人，增长了3786.2倍，培养类型也从单一型转向了多样化。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政府在这方面出台了多项政策和相关措施。如1980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扩大研究生数量并完善研究生培养和学位制度；1996年原国家教委出台了有关研究生招生类型、考试方式、培养方式等方面的细则；2001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次召开全国专业学位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不断加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力度。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使我国学位体系不断得以完善，研究生培养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稳居世界首位，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智力资源，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贡献度显著增强。高校毕业生成为我国新增劳动力的主力军（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3.3年），有力

地支持了我国的工业现代化建设。

(二) 科学研究整体水平与成果转化率提高, 高校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策源地

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国就建立了以中国科学院为主、高等学校为辅的国家科研系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逐步建立起中国科学院与高校并列的科研体系, 高校的科研能力快速提升, 科研成果日渐丰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实施的“211工程”和“985工程”, 极大地促进了高校学术科研水平的提高。2019年我国有12所高校进入世界排名前200名, 有6所高校跻身世界排行榜前100名; 截至2018年6月30日, 中国大陆有241所高校进入ESI排名全球前1%, 高校发表了全国80%以上的SCI论文, 承担了全国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产出了全国70%以上的科技成果和80%以上的社科成果;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授奖项目共239项, 其中144所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奖198项, 占授奖总数的82.8%, 科技成果直接交易额达130.9亿元。

这一时期, 高等学校服务国家产业发展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 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和产业化发展推动了高校科技与国民经济的紧密结合。1994年, 原国家教委等三部委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发展科技产业的若干意见》, 系统地提出了发展高校科技产业的指导思想 and 基本原则, 推动了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 以北大方正、清华同方、东大阿尔派、上海交大昂立、云大科技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校科技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成为我国科技大军中的有生力量。21世纪初,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推进, 高校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标准,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实施创新创业教育, 培养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毕业生, 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引擎”。2015年, 一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突破传统大学重学术轻应用的路子, 把办学思路从追随老牌本科院校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上来,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三) 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 在摸索、学习与创新中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将社会主义建设从“全面仿苏”逐步转向“走自己的路”,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也经历了多次调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 路径更加清晰。1993年2月,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 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 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 非政府组织开始成为办学主体之一。一直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紧紧围绕“放权”和“激励”来开展。1994年后, 在“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的指导下, 中国整合了900多所高校, “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 以地方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得以形成。进入21世纪之后, 政府强调高等教育的公共服务职能, 推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深化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 实现了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从“政府控制模式”向“政府监督模式”的转型, 依法办学、依章程治校的管理框架开始形成。

(四) 高等教育发展日趋均衡, 民众对高等教育公平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 党和国家扮演着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者、财政支持者与资源调配者等多种角色。鉴于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影响民众的满意度,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放在重要位置, 这也是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在。但是,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高等教育现实与人民对优质高等教育追求日益增长的需要难免会出现矛盾, 即便高等教育不断市场化, 忽视公平也必定损害整体发展。因此, 中国共产党根据公众的社会诉求, 采取了系列有效措施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首先是初步消除传统

较发达区域的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保证不同地区考生的入学机会基本公平。其次是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城乡孩子入学机会基本均衡，通过提高乡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与政策性调整招生指标分配等方式来增加农村学生进入顶级大学的比例。这些政策措施均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中国共产党并未止步于取得的成绩，始终将教育公平问题放在教育发展的重要位置上。《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将“着力促进教育公平”作为重要目标，通过高考政策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倾斜、加强对“高考移民”的治理、取消高考不合理加分政策等系列措施实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同时，国家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构建了大学和学科的合理竞争机制，促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此外，国家加大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力度，探索并创新了多种助学方式，吸收社会资金，形成了国家、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资助体系，平衡了不同阶层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提升了民众对高等教育公平的满意度。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发展的未来展望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质量提升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口，我们既要总结中国共产党发展高等教育的历史成就，更要着眼于未来发展，“以提高质量为战略主题……以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全面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同时充满信心地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

（一）加快向内涵式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从整体上看，百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高等教育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矛盾比较突出，高等教育质量亟待提升。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由粗放型向创新型转型，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但是，由于我国客观上“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认识与实践还不够，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制度还不健全”，还存在重专业轻通识、重科

研轻教学、忽视人格培养、功利化办学、师资结构不佳、办学特色不足、国际顶尖大学过少等方面的不足，“如何转变发展方式以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今后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达成这一目标首先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确保大学牢记生产高深知识的使命，既面向市场又要抵制市场对大学精神的可能侵蚀；其次要坚持“立德树人”，更加重视培养大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和高尚人格魅力；第三要优化高等教育结构，鼓励大学再地化，推动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第四要坚持质量至上，加强本科教育，优化学历层次较高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总之，高等教育质量改革永远在路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发展高等教育质量的理念融入高等教育教学的行动中。

（二）以“权力下放”为中心，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实质上来自高等教育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其关键在于，要形成合理的大学治理结构，促进各利益主体平等多元和互依共存，使政府、大学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协调并相互制约。我国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以激发更多创造力。从高等教育外部来看，我国现行法律赋予高校的自主权非常有限，且权利含糊不清；从高等教育内部来看，教职工参与内部民主管理的权利有限，对学校管理的话语权过弱。此外，高校的监督机制十分薄弱，存在外部监督严重不足的现象。

教育现代化首先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旨在解决教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制度障碍、利益冲突、权力矛盾等，从而实现教育强国。国家要建立合理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就要构建各利益相关方之间有序的关系，逐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现代治理体系；要理顺各利益主体间的地位和关

系，明确各自的职能，让权力逐级下放；要通过协调政治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三者的关系，促进对高等教育权力的重新分配。当前的大学已经是结构复杂的“航空母舰”，只有具有专业管理才能的“舰长”才能驾驭。因此，未来的大学需要加强行政权力。这是大学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遗产的基本职能所必需的权力，当然这要受到学术权力和有关法律制度的制约。政府要在对大学给予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坚持放权，让大学建立自我监督机制、依法治校，防止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现象；要通过完善大学章程，建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实现管理与自律之间的平衡。

（三）以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重点，提升高校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科研水平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表征，也是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能力体现，高校科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伊丽莎白·波普·贝尔曼指出：“学术研究是开创新行业或彻底变革旧行业的创新源泉，具有积极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学术研究可能成为经济引擎。”因此，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发挥大学科研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当前，我国高校科研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有限，科研实力亟待加强，高校需要主动参与社会服务，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寻求更多经费投入与支持。如2015年全国高校科研成果以合同形式转让的只有2257件，转化率不足3%，出售和转让收入只占到总拨入科技经费的2.5%。这其中既有大学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的市场价值认识不足的原因，也有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中政策限制过多的原因，还有产学研结合不充分等因素。高校进行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服务教学和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这就要求科学研究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特别是在以创新驱动为主的新背景下，高校应重视科学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引擎功

能，提升市场逻辑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将产业的现实需求和高校的科研能力结合起来，通过制度安排推动科技成果、专利、品牌等无形资产价值的市场转化。

（四）始终把握教育核心之问，构建“金课”“金师”共存的教育生态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教育核心之问，不管未来教育形态发生何种变化，教育核心之问都应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德育是五育之首，未来高等教育要更加注重以德为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创造性地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学生的奋斗精神，弘扬学生的劳动精神，同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政治觉悟。

“金课”是当下高校教学质量建设的主流话语，在未来教育发展中将进一步被强化。“金课”之“金”反映在高阶课堂、对话课堂、开放课堂、知行合一、学思结合5个方面。“金课”建设过程是高校一流课程建设的过程，也是国家培养一流人才的过程。“金课”形态多元，因课程类型各异，随教育工具与手段的变化而不断裂变，呈现多样性特征。如2020年因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而出现的“分离式金课”，就是在教学分离的情况下，以结果为导向，从整体观的视角出发，将一般性教学规律与既定条件下的特殊规律相结合，并以此为准则制定的教学内容和进程计划。未来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科技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全面渗透，对内涵越发丰富的“金课”的追求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常态。

“金师”是“金课”的建设者，“金课”的建设过程也是培养大批“金师”的过程。《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要求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意味着“金师”培养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我国在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大量“金师”的加入和奉献，从而不断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奠定基础。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需要解决

教师结构性、阶段性、区域性短缺问题，强化职前教师培养和职后教师发展的有机衔接，夯实契合现代科技发展路向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推动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自主发展。人是课程建构的决定性因素，未来高等教育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始终“眼里有人”，构建起“金课”与“金师”共存的新型教育生态。

（五）勇担重塑中华文化自信的重担，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

坚持文化遗产与增强文化自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功能，对有着五千多年发展历史的中华文明来讲具有特殊意义。尤其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重要时期，这一历史重担更是高等教育不可推卸的使命。

从中世纪大学发展到如今，大学逐步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与文化遗产的职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就曾指出，大学除了其传统的职能外，还应该成为面向全民的文化场所和学习场所。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大学在文化遗产与创新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如过分强调社会服务功能而导致市场文化与功利主义的过度张扬，造成对人的价值、社会发展和精神境界等宏大命题的疏离，没有很好地发挥重塑中华文化自信的作用。为此，我国高等教育既要秉承大学自有的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具有批判精神等优秀传统，更需坚守培养人才、探寻真理、创新知识的文化职能，抵制功利主义的侵蚀，还要肩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重塑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因此我们要加强文化自信，以主体身份积极参与全球文化建设。我们积极参与高等教育的全球治理既是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由大到强过程中必经的环节和必须正视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的报告《重新思考教育：迈向全球共同事业》指出，教育要进一步成为全球的“共同事业”。过去我国长期缺席高等教育的全

球治理，在国际上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此，未来我国高等教育需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行动框架》下，努力拓展教育合作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首先要坚持“走出去”。一是通过培养国际高等教育组织管理人才并积极输送到相关机构，通过这些人才所在的机构更好地参与高等教育国际规则的制定；二是大力倡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高校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在已有的“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等组织基础上，发起建立更多的区域性高等教育联盟或合作组织，在国际高等教育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向沿线高等教育薄弱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其次，要努力创造条件，搭建各种平台，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参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同时通过提高自身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促进全球共同利益的实现、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将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改革方向。

四、结语

百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和发展高等教育，中国共产党从政治、思想和组织各个层面，通过制定国家教育方针、采取行政手段和必要的措施不断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发展中的矛盾迫切需要通过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来予以解决。因此，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发展高等教育的历程与经验，既可以在新时代历史背景下审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过去，又可以更好地谋划高等教育发展的未来，还可以努力探索和积淀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并不断推广，以期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

（郑庆全，教育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江苏淮安 223300；杨慷慨，重庆文理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讲师、副所长，重庆 402160）

（原文刊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1年第2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与经验启示

闻德亮 丁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医学教育源于革命战争年代我党生存壮大的迫切需要，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我党我国的发展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其特有的红色基因经过战火硝烟的反复锤炼磨砺，铸就了有别于其他国家医学教育的独特气质。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医学教育始终以服务人民健康为己任，为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大计贡献力量，为救国、兴国、富国和强国目标的实现努力奋斗。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国高等医学教育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首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对于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求索奋斗 勠力救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均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偏僻村庄或山区，加之面临国民党军队重兵的围剿和封锁，专门卫生人才十分有限。1928年红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提出“健全卫生机构”和“训练专门人才”的要求。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向中央军委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并得到批准。同年1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宣告成立，贺诚兼任校长。军医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建的正规学校。创办伊始，毛泽东同志就为学校确立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课程的设置，从战争的实际出发，精简内容，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以达到学以致用、短期速成的目标。

办学伊始，战事频仍，军医学校师生除上课学习外，还要参加各种战地救护工作，军医学校在战火中成长。1932年8月校舍从雩都（今于都）迁到茶岭时，教员仅有5人，教室由数间民房组成，教材由教员自编，讲义由学生自刻蜡版，自己油印，教学设备仅有挂图和1具人体骨骼标本及2台显微镜。全套家当用一匹马就可以拉走，故有人戏称当时的军医学校为“马上学校”。同年10月，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先后招收了调剂班、看护班及卫生班。

1933年7月，学校迁至红都瑞金，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学校得以迅速地发展和扩大，教员增至十几名，全校学员约为500人，编为一、二两个大队。设备更为充实，学校有了图书室、解剖室、动物实验室、标本室、模型室、细菌检查室、细菌培养室、化学实验室和瓦斯预防室等，显微镜增加到7架，模型已有数百种，自制孵卵箱，添购参考书400余种。理论教学与临床设备的运用结合更为密切，开设有外科手术室、手术前准备室、消毒室、隔离参观台、X光室、理疗室等。学校还创办了《红色卫生》《医学摘要》等20多种刊物。同一时期，为适应红军作战和部队发展的要求，凡是有条件的医院以及军团和省军区的卫生机关纷纷开办了医护学校或看护训练班。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卫生学校就跟随中央纵队过湘江，战黎平，四渡赤水，两过乌江，强渡大渡河，雪山草地，经吴起镇夹金山到达延安，最终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卫生学校的师生们一边战伤救护，一边学习，克服了诸多困难，创造了世界医学教育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学校的第六期学员在长征途中成功毕业，在最危急的时刻，成为我党我军医疗卫生的中坚力量，学

校的师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晋察冀军区不断扩大，医务技术人员急需补充，1939年9月18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胸外科医师诺尔曼·白求恩直接参与了学校的创建工作。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为了救治伤员在手术过程中左手中指受伤，感染化脓，发展为败血症不幸逝世。1940年1月为纪念白求恩将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学校，此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前身。

同期，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随军赶赴山西抗日前线。1940年3月，学校迁至延安。同年9月，经毛泽东主席提议，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从此，中国医科大学跨进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学校分为四科：高级军医班、普通军医班、调剂班、特别班。高级军医班实足上课二十四个月，普通军医班和调剂班实足上课十八个月。学校的设备比较齐全，其中解剖、生理、细菌各学系设备较好，细菌学系有较大的实验室两栋20间，设有接种室、血清制备室、动物室，用来教学、制作疫苗和预防血清。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作为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成为学生的实习基地。学校的教员由来自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爱国医学精英和米勒、富莱、阿洛夫等国际友人组成。在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第十四期学员，也是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后的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之际，毛泽东主席为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一题词不仅指引中国医科大学前进的方向，也成为全国医务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座右铭。

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发展迅速，对卫生技术人员需求与日俱增。为此，中国医科大学于1946年着手对教学内容和学制进行调整和改革。1947年10月，大学正式启用专科重点制和形象教学法，极大地提升了专门医学人才的培养速度，在两年时间内，大学培养了3000多名战伤外科医生。实践证明，在大兵团作战的背景下，中国医科大学的教学改革有力地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中国医科大学奉

命进驻沈阳，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崭新阶段。学校驻沈阳后，教学环境稳定，教学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模式开始从军事医学转向更广泛的范围，逐渐成为一所新型正规化的综合性医科大学。

在革命斗争中，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在党的关怀领导下，不断探索奋斗，将自身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铸就了不惧苦难险阻、敢于担当责任、勇于探索创新的政治品格，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并向着这一目标不懈奋斗。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已经建立了中国医科大学、华北医科大学、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以及第四野战军医科大学等一系列成规模的医学院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医学教育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发展夯实了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曲折改造体制建立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完成高等医学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医药卫生人才，党和人民政府首先制定了我国教育方针和卫生与健康工作指导方针，明确了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和任务。教育、卫生等部门按照我国国情，迅速接管各类医学院校，进行了领导体制改革，优化了院系、学制和专业结构，推动了教材建设和师资培养等工作，逐步形成我国自己的高等医学教育体系，满足了社会对医学教育的需求。

在院系调整方面，1952年7月，我国开始了旨在合理布局的第一次调整。对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进行了合并，并且有计划地将沿海的一些学校迁往内地。1955年，国家开始启动第二次调整，扩大了我国医学院校规模，同时采用老校支援新校等办法新建了一批高等医学院校。1954年全国医药院校在校生达到了27042名；截至1957年，全国医学院校总数达到了35所。

在学制和专业设置方面，1954年7月26日至8月5日，高教部与卫生部联合召开第一届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在明确了高等医学教育的具体方针任务和培养目标的同时，也确定了学制、各校

的专业设置，统一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1963年经教育部和卫生部研究决定，准备分批将五年制的医疗、卫生、儿科、口腔四个专业的学制改为六年；四年制的药学专业延长为五年。

在教材建设方面，1954年我国引进了苏联的教材，但经过2~3年的试用，发现苏联教材分量过多，内容也不尽适合我国情况。因此，1956年我国组织医学教育工作者开始自编教材，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出版发行了中、高级各科试用教材以及实验实习指导和教学参考书206种，初步完成了教材体系的建立。

在师资培养方面，20世纪50年代初期，卫生部医政局医学教育处组织了一系列高级和中级师资进修班。1962年11月20日至28日，卫生部召开了部分高等医药院校师资培养工作座谈会，制定了师资培养办法及制度，并要求全国重点医药院校教研组有骨干教师2~3名。据统计，1962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的专任教师达11517人，约为新中国成立前的4倍。

1956年，在党和国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建立了四所中医院，成为中国最早的四所中医药高等院校。之后各省相继建立中医学院，我国中西医并重的高等医学教育体系初具雏形。

受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思潮的影响，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开始了无序的扩张，医学院校数量一度激增5倍，出现了大幅缩短课时、合并不同学科课程等乱象。1960年，党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高等医学教育事业进行了调整，到1963年，只保留85所高等医药院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从斗、批、改到全国性阶级队伍清理，医学院校和医学教育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据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招生9万余人，而期间招收的1.6万余工农兵学员由于接受训练不足，需要进行补课和复训。使得我国的卫生技术人员队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层。

回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成功接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学校，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医学教育制度和体制与合理的布局，完成了系统的教材建设，并且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医疗卫生技术人才，过程虽有曲折，但这无疑是我国医学教育取得的重要成就。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快速扩张 质量保障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的医学教育步入恢复调整阶段，再次焕发勃勃生机。为了在短时间内培养出高质量医学卫生人才，党和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医学院校进行了全面整顿改革，特别是建章立制和组织建设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1985年教育部、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提出了高等学校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完善了学校管理制度。同年，国家成立了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专门负责卫生行业各类专业人员执业资格考试、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全国卫生系统外语水平考试等专项考试的考试设计、考务管理，其建立加强了我国医师队伍准入质量的控制，切实提高了我国医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而后，党和主管部门根据“宽窄并存，以宽为主”的原则于1986年和1988年先后两次对医学教育专业目录进行了修订，在继续保留通用专业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社会急需的新兴专业和短缺专业。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首次专门针对医学专科教育发布了一系列的指导文件，其中包括《制订高等医药专科专业教育教学计划的原则和基本要求》《普通高等学校医药专科基本专业目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医药专科专业的原则规定》等，为我国高等医学教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政府导向的院校合并风潮席卷全国，原独立设置的医科大学纷纷并入没有医学院的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实现强强联合、促进资源共享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教育部的数据，1990—2006年间全国共有46所各级各类高等医学院校（含中医、药学、高专、职工）并入综合性大学或非医学类多科院校，其中卫生部11所直属重点医科大学有9所并入综合性

大学。院校合并后的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在教育管理体制、专业结构、人才培养、招生形式、师资发展、临床教学资源及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为培养引领世界医学发展的高层医学卫生人才打下了重要基础，使我国在全球医学教育领域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质量保障始终是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不懈追求的目标。除了建设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制度外，医学专业认证制度建设成为我国高等医学教育进入新千年后的工作重点。2008年，在对包括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标准（2003版）》在内的相关标准进行的深入研究后，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正式发布《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同年，我国组建了自己的医学教育认证机构“教育部医学教育认证专家委员会”和“教育部临床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正式启动了临床医学专业的认证工作。认证制度的建立对于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理念的更新、教学改革的推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作为我国独具特色卫生资源的中医药也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2009年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中提出要改革中医药院校教育，完善中医药师承和继续教育制度，拉开了建立健全包括院校教育、师承教育、继续教育在内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途径的中医药教育体系的序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医教协同创新发展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福祉，将教育和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为了培养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的医学人才，高等医学教育应与卫生健康部门协调合作，根据人民卫生健康需求，不断推动医学教育改革，此即为医教协同。这一基本思想于2011年召开的全国医学

教育改革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2013年12月，国家卫计委、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3〕56号），为医教协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2014年6月，教育部、国家卫计委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教研〔2014〕2号）明确指出，到2020年中国要基本建成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的、规范化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做到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并明确提出医教协同的概念。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63号），为深化医教协同推动医学教育改革做出了进一步部署，以需求为导向，以质量为核心，完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合格医学人才，特别是紧缺人才的培养。

为了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日益旺盛的需求，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国发〔2016〕15号），特别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从思想认识、法律地位、学术发展与实践运用上落实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平等地位；建立健全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有机衔接以及师承教育贯穿始终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以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与此后相继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共同构建起了我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自此，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上升成为国家战略，驶入快车道。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国家战略，以及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健康中国战略。为了指导高等医学教育发展，促其更好地为这两大国家战略服务，

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4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新时代医学教育改革创新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基本国情，以服务需求为导向，以新医科建设为抓手，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分类培养研究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意见》特别强调以新医科统领医学教育创新，对现有专业建设提出新要求，建设一批新的医学相关专业，强力推进医科与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意见》的颁布标志着中国高等医学教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医学教育的辉煌成就

（一）医学育人体系日臻完善

在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殷切关怀下，几代高等医学教育人遵循教育规律，锐意改革，不懈奋斗，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且结构完备的医学育人体系。

1. 全程思政育人。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各医学院校均努力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医学生教育教学全过程，以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为祖国和人民培养“卓越好医生”。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加入医学史上众多名医的先进事迹的思政课程，在人体解剖学中加入“大体良师”致敬教育的课程思政，在校史馆、生命科学馆、医药博物馆进行的思政实践，以及在临床实训、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中嵌入医德教育的实践思政。

2. 调整学科学制。经过数次调整，我国已形成11个一级学科，54个二级学科，全面覆盖基础、临床、口腔、公共卫生与预防、中医、中西医结合、药学和中药学等各个医学相关领域。特别是以“5+3”（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主体、“3+2”（3年临床医学专科教育+2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为补充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基本确立，全科和儿科等紧缺人才得以补充，公共卫生、药学、护理、康复、医学

技术等人才的培养协调发展。

3. 完备课程教材。1995年，中国医科大学等四所医科大学获得国家教委《高等医药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资助对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进行探索。接轨国际医学教育模式，顺应医学教育发展的趋势，形成了诸如中国医科大学的“楔形”整合课程体系，西安交通大学的基于“器官-系统”的课程整合体系等研究成果。201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器官-系统”整合规划教材（共计28本），是我们国家第一套器官系统整合教材，完成我国临床医学专业教材的两大体系的构建。截至2019年末，该教材累计印数18万册，为全国80余所医药院校所采用。

4. 住院医师规范培训。住院医师培训是毕业后医学教育阶段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制度化和规范化是培养能看病、会看病的“标准化”医生的关键。2013年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3〕56号），2014年在全国开始实施。2014年6月，教育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教研〔2014〕2号）。同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国卫科教发〔2014〕49号）。目前，全国统一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已经初步建成。

5. 教学科学评价。教学评价是保障医学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式，是高等医学教育育人体系的核心要素，而建设高效的医学题库是保障评价科学性的重要手段。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医科大学联合国内近20所重点院校研发医学考试综合题库，成果获得了全国范围内院校的广泛好评，为国家医师资格考试试题开发提供了宝贵经验。进入“十二五”以来，中国医科大学牵头来自国内17家知名医科院校的千余名专家共同建设中国医学教育题库，包含试题18万余道，覆盖36个学科。其在医学教学管理效率、本科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的完善与提升作用获得了众多专家和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评，为我国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和考试评价体系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与保障。

（二）医学人才供给持续扩大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体系培养的医学人才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早已今非昔比，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夯实了多层次且多样化的人力资源基础。数据显示，2019年普通高等院校医学类招生人数为100.6万人，相比于2013年增长59.6%；在校学生数量为331.5万人，相比于2013年增长46.9%；毕业生人数为82.8万人，相比于2013年增长48.2%。（见图1）同时，近五年的招生数量、在校生成数和毕业生数量分增长率分别为41.2%、29.8%和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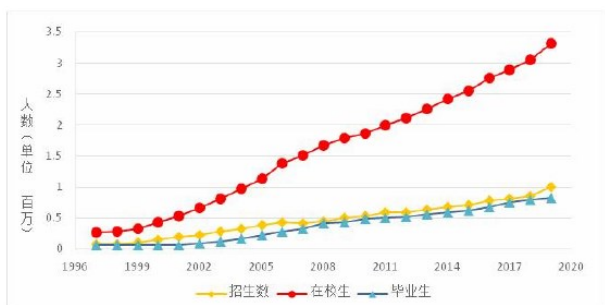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医学专业招生、在校生成数和毕业生数量变化趋势



图2 我国医学专业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量、普通高校招生数量、研究生招生占比变化趋势

同时，我国医学教育的医学人才培养的层次也在逐步提升。2020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表明，我国医科学科门类下设有11个专业类58种专业，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口腔医学、药学、中医学、中药学、护理学等专业。从2009年开始，医学相关的专科招生人数持续下降。而在保持普通高校医学专业招生持续增长态势的同时，研究生的招生比例始终维持在10%左右。（见图2）体现了医学教育精英教育的本质。数据显示，2019年医学专业研究生招生数为10.1万人，相比于2013年

增长率为52.3%；在校学生数量为29.0万人，相比于2013年增长率为47.6%；毕业生数量为7.4万人，相比于2013年增长率为27.0%。招生数、在校生成数和毕业数三项关键量化指标的近五年增长率分别为34.5%、34.8%和18.8%。

（三）医学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质量建设是我国医学教育的内涵式改革发展的“主旋律”与“生命线”。

1. 确立临床医学专业教育标准。具有国际实质等效性质的中国特色医学教育专业认证实现了有组织有制度地由点到面的实施铺开。在2008年，教育部正式成立了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对全国高校开展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2020年6月23日，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以“无条件通过”的成绩正式获得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医学教育认证机构认定。这意味着，目前全国通过了专业认证的124所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可获多国行业的认可。

2. 充实医学专业教育质量载体。以“5+3”为主体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实现院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的有效衔接。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全面提升临床医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能力。同时，各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数量持续增加。2019年，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达到651个，各省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共1023个。74家高校附属医院为首批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这些功能齐备的住培基地为医学人才临床技能的磨炼和职业素养的养成提供了扎实平台。

3. 提升高端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以“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和“基础医学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为抓手，全面落实2019年教育部等国家部委联合发布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版”。医学专业结构得以优化，专业综合改革得以深化，医学人才，特别是高端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医科院校的这场“质量革命”如火如荼，推动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四）教育持续创新发展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取得

了一些成绩，但是医学教育人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遵循现代教育规律，结合中国国情实际，不断改革医学教育，持续创新教学模式，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教育发展之路，更好地为国家与人民服务。其中，医师胜任力为导向的系列研究与教学改革就是一个典型事例。2012年中国医科大学孙宝志教授团队在对全国31个省市8000多名执业医师，4000多名医学教育者、患者、管理人员、护士等利益相关方进行调查以及访谈后，构建了中国临床医师岗位胜任力通用模型。模型共分为8大核心能力：临床技能和医疗服务、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信息与管理能力、医学知识与终身学习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核心价值观与医生职业素养。此后，该团队又进一步借鉴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的里程碑标准研究和发展经验，根据在我国“5+3”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针对临床医学生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中各个阶段应该展现出的行为、态度和技能要求展开研究，建立了上述各核心能力发展的里程碑标准，为我国医学教育育人导向提供了指导。再如，国家集中优势跨学科资源构建医科，鼓励一流院校兴办一流的医学专业，体现医学教育的精英教育本质。截至目前，全国112所原“211工程”建设高校中，有42所高校设有医学院（部）或为独立办学的医学院校；在39所原“985工程”建设高校中，有26所高校设有医学院（部）；在42所“一流高校”建设序列中，设有医学院（部）的达30所，占比超过70%。这些办学基础雄厚、优质资源丰富、学科实力明显的综合性大学通过合并医科、新建医科、共建医科等多样化模式，积极开展医学教育。这些大学具有加大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和医学交叉学科建设，举办医理、医工深度结合的医学教育的能力，可有效地扩大医学人才的供给规模，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医学教育的经验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为人民健康服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系统总结了坚持党的坚强领导的宝贵经验，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意义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作用。回首历史，在党领导下的高等医学教育不断成长壮大，为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大计贡献力量，为救国、兴国、富国和强国目标的实现努力奋斗。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高等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只有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才能把握好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正确发展方向。因此，各医学院校应以建党百年为契机，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党委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夯实基层党的建设，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效果。

“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作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开篇语，彰显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将“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作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宗旨，指示、部署、推动了医疗卫生领域许多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要防治地方病，为人民造福”。江泽民倡导开展健康教育，指出“要在群众中继续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通过普及医学卫生知识，教育和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2006年，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指出，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是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标志，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自党的十八大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视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因此，高等医学教育当以满

足我国健康卫生产业人才需求为目标，以“双一流”建设为载体，推进胜任力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健全适应行业特点的医学人才培养制度，建立标准化和规范化人才培养质量观，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

（二）坚持立德树人，育中国卓越医生

中国卓越医师的培养应以立德树人为引领，因为立德树人始终是我党领导的高等医学教育的立身之本和价值追求。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主席为我党最早创建的院校——中国医科大学制定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办学方针，而后毛泽东主席又进一步提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构成了我国医德的核心与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用“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概括我国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精神。而这16个字于2019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对我国当代医疗卫生人员崇高职业精神进行了定义，也成为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立德树人的现实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医学院校需建立新时代医学院校医德教育新模式：应加强医师道德与职业精神相关研究，系统构建医师职业精神培养框架，锁定培养目标，升级培养理论与策略，探索医师职业精神培养长效发展机制；形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及继续教育三阶段全周期的培养模式及正式课程、非正式课程和隐性课程多维度的培养机制；在开展专业课学习的同时，加强医学人文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角度，探索更加完善的医师职业精神教学内容与方法；应贯通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立医德理论教育体系；应贯通思政实践与实践思政，建立医德实践教学教育体系。

中国卓越医师的培养应建立符合医学教育规律又兼具中国特色的完备体系之上。而高等医学教育体系应主动适应我国群众健康服务新需求和健康产业发展新要求，全方位推进医教协同育人，加快建立医学人才招生、培养、就业等方面的协同联动机制，形成医学本科教育、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间的有效衔接，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一流医学专业，优化医学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围绕全周期全过程维护群众健康需要，深化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中医学类、中西医结合类、医学技术类、护理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快培养不同类型医学人才。

中国卓越医师的培养应以医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抓手，创新能力是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必备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培养医学生的创新精神。这要求医学院校打破固化的教育观念，构建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自由探索的学习环境，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其次，促进医工、医理、医文学科交叉融合，建立医药基础研究创新基地，以推进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创新拔尖人才培养。将最新的科技文化前沿知识纳入医学教育教学过程中，将教育的成果落实到人才素质的全面提升上。再次，重视临床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通过实践环节，增进医学生与病人的接触，与社会的接触，从而解决学生知识学习与社会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培养和造就一批立志解决实际问题，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未来医师。最后，重视医学生国际视野的拓展。随着全球化向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应加强与国际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培养具有世界格局和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拔尖创新医学人才。

（三）坚持守正创新，推进新医科建设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急剧地重塑与重构着高等医学教育体系。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奔腾而至，如果我们不应变、不求变，将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个时代。”为了应变求变，高等医学教育亟须守正与创新。其中，“正”是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始终以为人民健康服务为根本任务，培养有救死扶伤的道术、心中有爱的仁术、知识扎实的学术、本领过硬的技术、方法科学的艺术的中国好医生；而“新”指

以新医科建设为统领，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分类培养研究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作为高等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统领，新医科的建设应围绕新理念、新专业、新要求、新模式和新体系展开。首先，新理念是指以“大健康”的理念引导新医科的建设，以服务全民的生命全周期，呵护全民健康全过程的理念协同发展医疗卫生系统以及与新医科教育系统，将发展重心从疾病治疗转为健康促进。其次，新专业的含义通过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代表技术与医学的深度交叉融通，在精准医学、转化医学和智能医学等新领域内，形成了新学科、新专业和新课程，以贯彻大健康的新理念。再次，新要求是指为了贯彻新理念和应对新兴技术所带来的变革，对已有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评价体系等方面的新要求。第四，新模式是指为了推进医科与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以培养少而精、高层次、高水平、国际化的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医学未来领军人才，而进行的“5+3”一体化医学教育和“医学+”复合性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最后，新体系是指不同类型高校发挥各自优势，各司其职，构成新医科建设的分工合作体系，同时辅以各层级政府和各院校的制度创新，从而确保新医科有序的持续发展。

为加快推进新医科建设，应汇聚高等医学院校力量，统筹规划，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首先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第一，院校分工合作。优势综合性大学，应该发挥自身学科齐全的优势，在学科交叉建立新学科、新专业、新课程方面起到主体作用；优势专科学校需要与优势工科大学进行交流合作，起到引领的作用；地方高校要根据区域需求，为区域的卫生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第二，学科借鉴交叉。医学的新发展和医学产业的新要求，使得新医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and 实践。借鉴国际“医学+”学科建设经验，对接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能医学等新理念，展开了新学科建设的探

索与尝试、专业的优化与升级以及课程的改革和创新。第三，实践教学育人。在强调临床实践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做到院校、医院和企业携手共建医工、医理和医文结合的实践教学基地，让新学科、新专业和新课程培养出的学生，拥有理解新理念、掌握新知识和实践新技术的机会，真正实现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第四，培育优秀师资。打造师德高尚、基本功扎实、教学方法先进、敢于创新的教师队伍，优化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打破学科的壁垒，增强交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能力，科学评价教师水平，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为学科交叉提供人力资源基础。第五，完善保障制度。构建党中央、主管部委、地方政府和各高等院校联动体系。中央部委起到政策的保障、经费的统筹、和监督的指导作用。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应的衔接和管理政策，支持、引导、监督好高校对新医科的建设。各高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政策的引导下，发布行动方案，及时总结标志性成果和自评报告，接受各方监督。

在过去一百年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根本改变了历史命运，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用鲜血、汗水和泪水写就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时刻，所有医学学校都应坚持党的坚强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守正创新，推进以新医科为统领医学教育创新发展，为满足人民卫生健康需求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守护人民健康的中国卓越医生。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的高等医学教育还要继续勇往直前，开拓奋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闻德亮，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教授，辽宁沈阳 110122；丁宁，中国医科大学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辽宁沈阳 11012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8期）

建党百年之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建设回望

李 芒 石君齐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对加强高等院校教师培训制度建设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取得了卓越成效，为民族独立、执政兴国、改革开放、民族复兴培养了大量高级专门人才。在新时代，回顾总结高校教师培训制度探索的百年历程，把握培训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对于建设政治素质过硬、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高校教师队伍，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是嵌入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和惯例。制度并非规范化的静态文本或结构。在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动救国大业、兴国大业、富国大业、强国大业的百年历史中，我党始终是红色培训制度的设计者，将高校教师培训制度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及文化体制等紧密相连。按照党史的四个关键节点，可以将建党百年来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大致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助力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改旧立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规范壮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走向辉煌”四个时期。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助力革命（1921—1949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我党领导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个关键节点。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我党把培养具有高度民族意识、忠诚于国家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的干部视为高等教育首要目标。当时，我党创立的大学常被称为“干部学校”。从早期的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到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延安大学等，我党在投身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师培养模式。

首先，我党高校教师多由党的领袖、理论

家、高级领导人直接担任，是当时组织里最强的理论阵容，多具有留学背景、战争实战经历，既擅长理论，又擅长实干。如毛泽东、瞿秋白、李大钊、朱德、周恩来等分别曾在上海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任教。党的高级干部研修方式肇始于湖南自修大学的方法——研究讨论会，如抗战时期为党的高级干部组织各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会，注重学术性的理论探讨。其次，我党高度重视培养红色大学教师，将大学教师视为思想传播者、行动组织者及信仰实践者，主要依托所建的各类学校，采取自学为主、讲授和报告为辅的研讨形式，传播党的理论，从思想上武装教师。党的领导人对教师给予教学方法的专门指导，如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培训的十大教学策略，指出干部培训应该使用讨论法等。据此，迅速构建了党支部教育、短期在职培训班等培训模式，听课学员学成之后继而为师，实现教师队伍的迅速补充。再次，摒弃旧社会劳心与劳力分离的传统，注重教师培养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如延安大学、自然科学学院教员须参加经常性的生产劳动。最后，教师在职培训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我党高校不仅选聘具有实际工作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担任兼职教员并与其他教师互动，而且要求任课教师有计划、有系统地对解放区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并定期参与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将实际经验提升至理论高度，丰富教学内容。但由于此时期高等院校不时受到战事影响，大学教师培训尚未形成规范。在艰苦条件下，教师培训遵循按需培训、少而精的原则，始终服务于我党救国大业的历史使命。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旧立新（1949—1978年）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

着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确定，高等教育作为重要的文化制度之一亟须文化改造和课程改革，从而有力支持国家改善经济落后的面貌。此阶段，高校教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既是建设的“先锋者”，又是人才的培养者。国家发文保障高校教师的培训工作，培训重点是肃清反动思想，提高理论水平，增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通过选派进修的方式迅速提升教师的开新课能力，确保高校教学科研工作迅速步入正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旧制高等教育的接管和改造。1950年首届高等教育大会召开，明确了高等教育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防建设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旧高等教育，逐步推进高等教育轨道化和计划化。此时，高等院校学生数量增加，而教师素质普遍偏低，多门课程无法开展。迫于开课的急迫压力，最初的教师培训往往仅限于对一门课程的学习，1953年《高等学校教师进修暂行办法》中明确指出“各校选派教师进修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该进修教师的业务水平，回校后能独立担任某一课程的教学工作”。我国全面学习苏联专业模式和课程模式，如选派教师到苏联学习、邀请苏联专家来华培训教师等。直至1956年，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师范学校研究生班（高师师资训练班）试行办法》《高等师范学校助教培养试行办法》《高等师范学校进修教师试行办法》，明确大学师资培训的目的由补课转为提高水平，重视教师的系统专业知识，不仅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能够初步从事科学研究。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又称《高教六十条（草案）》）颁布，规定高等学校必须继续努力培养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必须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教学既要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学，又要重视生产劳动、实验、实习等基本技术。同时，教师应该在保证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对于新担任教学工作的教师和开新课的老教师，主

要要求他们把教学工作做好，可以少参加或者不参加科学研究。

为了建设新中国的高校教师队伍，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高校教师的专业能力，主要途径包括助教培养、研究生培养和教师进修。助教培养和研究生培养主要通过遴选高年级德才兼备的学生作为助教和研究生，以脱产进修和系统听课的方式进行，增强高校未来师资力量，成为高校教师职前培训的重要环节。1966—1976年，我国高等教育遭受严重破坏，大学教师培训工作被迫全面停顿，《高教六十条（草案）》、高校师资训练班、助教培养试行办法、进修教师试行办法等制度遭到废止。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规范壮大（1978—2012年）

第三个关键节点是改革开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量科学技术人才。高校教师培训密切配合国家战略，通过法制建设规范教师培训，鼓励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培训方式，重视科学研究，以满足国家经济体制变革、加速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可以将该时期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教师队伍的补短重建（1978—1993年）

“文化大革命”以后，高等教育面临教师年龄老化、青年教师基础理论差、专业基本功欠扎实、后继者匮乏、教师团队知识结构失调等问题，导致基础课和专业课开设不足。为迅速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校，实现教师队伍的补短重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统筹安排高校师资培训工作，恢复“文革”前的教师培训制度。1980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接受进修教师工作暂行办法》，同年10月，又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师范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这两个文件的颁布，从根本上确定了此阶段我国高校教师在职培训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截至1984年，高校师资培训主要面向“亟须开课的教

师”，主要采用进修一门课程为主的培训方式，采取单科补习、讲习班、讨论班等培训形式使任课教师取得任课资格或相应学历，目的是解决教师业务荒疏、知识陈旧等问题，使进修教师迅速适应教学工作。同时，党和国家从科研、生产部门选调部分专门人才，到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任专职或兼职教师。

1985年初，上一时期的历史问题已经得到初步整治，教师培训重点已由进修一门课程为主逐步过渡到以提高青年教师素质为主的“助教进修班”和涉及各个学科的“学术骨干专题研讨班”。同年，为了解决培训力量不足的问题，原国家教委分别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建立了高等学校师资交流培训中心；次年，又在全国六所直属师范大学建立了各大区高师师资培训中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也依托条件较好的师范院校建立省级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至此，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以重点院校的重点学科和省级培训中心为培训点的高校教师培训网络体系。

（二）教师培训的法制建设（1993—1998年）

20世纪90年代初期，教育管理从政策化走向法制化。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要求“加快教育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系统，逐步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高校教师培训也迎来了法制化时代，政府重点规范教师培训的资源配置。

此时，高校教师培训体系面临诸多问题，如有关部门对师资培训工作认识不到位，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等职能部门责权不明，教师培训工作不规范，随意性成分很大。因此，1996年4月，原国家教委颁发了《高等学校教师培训规程》（下文简称《规程》）。作为《教师法》的配套性法规，《规程》首次以法规的形式规范高校教师培训工作，规定“高等学校教师培训是教师更好地履行岗位职责而进行的继续教育”，明确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以及有关培

训中心的职责，强调制定教师培训规划，加强部门协调、配合，理顺关系，对培训工作的指导原则、组织管理、培训内容、形式及考核方式，以及培训保障做了细致规定。《规程》提出“高等学校教师培训要贯彻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并重，理论与实践统一，按需培训、学用一致、注意实效的方针。坚持立足国内、在职为主、加强实践、多种形式并举的培训原则”。

与前期以“补短”为目标的培训不同，此时培训的目标性、针对性更强。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高校师资培训细分为助教培训、讲师培训、副教授培训和教授培训四种类型。助教培训以教学科研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教学和实践为主；讲师培训侧重扩充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提高教学和科研能力；副教授培训主要通过教学科研及学术交流，熟悉和掌握本学科前沿信息；教授培训主要通过高水平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提高学术水平。另外，针对新入职教师，1997年，原国家教委特别颁布《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暂行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和《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细则》中对岗前培训的形式、学时、培训者、培训教材及考核方式做了规定，《纲要》则明确了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的四门课程（“高等教育法规”“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及各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学时数，并附有详细的教学建议。此《细则》和《纲要》一直沿用至今，有力保障了新任教师先培训后上岗。

（三）学术梯队的快速发展（1998—2012年）

在世纪之交的全球化进程中，为全面提升综合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将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纳入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中，提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并扩大招生规模，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我国高等教育从此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高校教师培训工作随即加快了步

伐，以建设骨干教师队伍和学术梯队为目标，全面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1999年，教育部颁布《关于新时期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强化教师培训，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实现高等学校教师培训工作重点和体制运行机制的转变：高校教师培训的工作重点从基础性培训和学历补偿教育逐步转变为更新知识、全面提高教师素质的继续教育；高校教师培训的运行机制从主要依靠政府推动逐步转变为政府、学校和教师个体相结合，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教师继续教育制度”。

高校扩大招生规模的新情况，造成先期教师数量不足、后期急速扩张导致的教师素质不均衡等高等教育质量危机。2001年，教育部颁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了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提出“高校教学质量的关键是要有大批优秀的教师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教授、副教授必须讲授本科课程，建设一支适应高质量教学要求的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2007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启动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该工程针对影响和制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强调重点“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加强教师培训力度，创新教师培训模式”。同时，教育信息化改革也推进了高校教师培训形式多样化。教育部批准高等教育出版社建设“精品课程师资培训项目与系统”“教育部全国高校网络培训中心”，通过遍布全国的省市分中心体系，组织开展以课程教学、专业建设、教师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培训，网络培训成为高校教师培训的新形态。

规范壮大期的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建设逐步规范化和法制化，教师培训首要目标是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高教育科研水平，培养学术骨干；培训形式多样化，除了常规培训以外，还包括公派留学制度、专题研究骨干教师研讨班、国内外学术会议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走向辉煌（2012年至今）

第四个关键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把教育事业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作为孕育和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高等教育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和历史性跃升。2015年，《全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出台，中央提出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更依赖于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教书育人水平。

高等教育经历了近十年的以扩大规模为目标的外延式发展，开始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进入全面提质创新的新时代。随着国外大学教师发展理念的引入，原有的“高校师资培训”概念逐步进化为“大学教师发展”，除了部属培训机构及各省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之外，国家鼓励建设校级教师发展机构，高校教师培训进入以专业自主为特点的走向辉煌期。

2012年，以“切实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为目标的教育部30所国家级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成立，系统推进“教师培训、教学咨询、教学改革、质量评价”等工作。随后，非部属高校也纷纷建立教师教学发展机构。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高校应该搭建教师发展平台，组织研修活动，开展教学研究与指导，推进教学改革与创新；次年，又发布《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提出让教师强起来，引导教师潜心育人，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完善教师培训与激励体系，加强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建设，重点面向新入职教师和青年教师，以提升教学能力为目的，开展岗前和在岗专业科目培训。自此，校级教师培训成为推动高

校教师个体发展的首要途径，包括讲座、工作坊、教改立项、教学督导等形式。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避免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多元、多样、多变思潮的冲击，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建设成为教师培训的重中之重。“十三五”时期，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等纲领性文件，为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2017年，教育部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此后举办百余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示范培训班。2020年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据此，课程思政纳入教师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师德师风、教学能力专题培训。同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共同下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推进常态化师德培育涵养，将各类师德规范纳入新教师岗前培训和在职教师全员培训必修内容。党支部活动、专题讲座与研讨、民主生活会、革命老区红色旅游等成为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培训与学习的主要形式。

在此期间，规模化构建了高校骨干教师队伍及学术梯队。随着对以人为本的大学教师发展理念的贯彻，培训模式由以往统一的国家级、省级的“同质化”培训转变为校级层面为教师发展提供个性化支持；培训目标聚焦于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和育人水平，帮助教师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切实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五、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变迁之内在逻辑

在我党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又红又专的教师发展方向，始终赋能各个历史阶段党的中心工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更加关注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持。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生成与变迁有着自身独特规律，而非单纯环境变迁的反映物。高校教师培训制度不仅受宏观制度环境主导，是不同时期社会制度的产物；同时也塑造和约束行动者策略，影响教师的利益界定，构建教师与制度的互动，实现制度共建，而且还在新旧制度变迁中显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作为一种理论分析范式，历史制度主义将行动者与制度相联结，发展出一种三维立体制度变迁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据此，针对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变迁的分析可从宏观的深层结构、微观的动力机制以及中观的路径依赖三个方面展开。

（一）深层结构分析：宏观制度环境主导培训制度变迁

高校教师培训制度的发展直接受到作为历史条件的宏观制度环境主导，国家战略意志是实现高校教师培训新跨越的直接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判断不同时期的基本形势和核心任务，使培训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各类资源极度匮乏，我党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了运用强制性行政手段配置各类资源的管理方式。高校教师培训也遵循“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统一规范的培训模式。沿用至今的“教师队伍”一词即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鲜明特征——“伍”为古代军队编制的最小单位，“队伍”原指军队，后引申为具有共同职责或特点的集体。“教师队伍”内涵集体性和团结性，意味着所培养教师团队的向心力、凝聚力与战斗力，体现中国共产党对教师组织的绝对领导，一直将教师视为“自己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重点针对旧教育进行改造，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高校教师培训亦延续上一时期的集中管理式培训，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胜任教学、科研工作的高校教师队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政府主导各行各业的“全能掌控型”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国家对高校的管理由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教师培训通过立法而规范，具体培训内容、方式则更具针对性、丰富性和灵活性。同时，一方面受市场经济“效率”思想的影响，时效性、有用性和规模性成为衡量培训优劣的首要标准，另一方面也因此出现形式主义培训、教师片面发展等新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为了适应世界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高等教育在“做大”的基础上转向“做强”，由强调“高速度”转向关注“高质量”。随着“教师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为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高校教师培训的需求，激发教师创新活力，培训权由中央集中管理逐步转向高校自主决策，寻求更具有主体性、精准度的培训模式。此外，为了修正上一时期过于关注短期培训成效、片面追求学术成果、弱化和忽视高校教师要求等问题，目前的培训呈现出加强提升高校教师思想信念等整体素质的制度导向。

（二）动力机制分析：行动者与制度的互动推动培训制度变迁

任何制度的演变不仅受到外在宏观条件的影响，而且不同行动主体与制度的博弈同样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可见，制度影响教师，而教师亦反作用于制度。任何教师并非孤立个体，而是深深嵌入在制度中的行动者。不同时期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对教师具有显著的导向作用，塑造着教师个体行为偏好。制度的形成过程是利益相关者多次反复作用以求实现制度均衡的结果，既符合党和国家需要，又满足个体教师需求，并符合教师职业发展规律的培训制度可以产生合力，实现双赢。正如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进入调整恢复期，高校逐渐恢复了大学教师职称制度、改善教师待遇，这些举措在高校教师群体中深得民心。此时的高校教师一方面出于对党的知识分

子政策落实工作的感恩，另一方面由于开课授课的压力，参与在职培训的热情高涨，使得我国高校师资培训工作迅速恢复。又如，近年来校级大学教师发展及“破五唯”政策的引入，为相对固化的高校教师培训打开了新局面、增添了新活力，制度对教师学识与教学的弘扬，温暖了苦苦徘徊于“以科研为导向的评价制度”中始终坚守本分、热爱教学教师的心，给热爱学生的教师带来希望。

然而，如果教师个体需要与制度目标不匹配，则会降低制度效力，成为问题滋生的土壤。培训制度关涉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断，而利益因素正是影响教师主体行动的重要变量。当现有制度无法满足教师需要或制度可以达成某些个体或团体的私利时，行动者会在现有制度中追求新目标。例如，国内访问学者进修制度对于很多教师来说，已不再是提升学术水平的学习机会，而成为混圈子、结交学术大师或个人旅游度假的方式。再有，由于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评价导向，导致教师参与培训的意愿低，致使很多培训流于形式。这类教师需要与制度供给的错位，作为一股潜在的力量推动了高校教师培训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促使我国高校教师培训由“供给—行动者—需求”机制向“需求—行动者—供给”机制转向。

（三）路径依赖分析：旧有制度惯性制约培训制度变迁

制度选择有路径依赖的特点，过往制度具有惯性力量使制度本身不断进行自我强化。制度一旦形成，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历史上某个重要制度会对当前制度型构的方向、内容和模式产生同质性影响。随着高等教育管理宏观权力结构由集中转向分化，政府下放培训权，高校单独设立教师发展机构，本应激发教师自主发展潜能，但却呈现出行政导向的路径依赖，有悖于大学教师发展规律。究其原因，在于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在创立之初，便确立了以集中管理为特征的

初始路径选择，之后在不断调整过程中，受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协同效应及内在复杂性和不透明性的影响，总表现出一种强烈维持现状的倾向，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习效应促进制度的自我强化。以往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会塑造决策者的认知架构，从而影响他们对问题的界定和方案的评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学习苏联模式所形成的政府主导高校管理模式，造成高校对于政府管理过度依赖，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处于长期失衡状态。由此滋生的“官本位”思想导致不少院校教师培训仍然从行政逻辑出发，将培训视为上下级的管理关系，片面追求培训规模而忽视培训质量。其次，适应性预期导致培训制度变革偏好风险规避。高校教师培训是一种集体政治生活，遵循集体行动逻辑——个体之间彼此存有适应性预期，个体决策后果高度依赖他人的行动，行动者必须不断根据对他人行为的预期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当一种培训制度突然做出改变时，除非决策者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定行动者会认可这种改变，行动者才会真正行动，因此导致改革难度增加。再次，协同效应造成培训制度变革成本高昂。高校教师培训并非依赖于独立的培训部门，而是处于整个大学教师管理架构之中，与教师考核及职称评审等其他高等学校管理制度深度关联，无形中抬高了制度变革的成本。现有制度体系经过多年发展已构成制度矩阵，制度间相关主体的协同效应形成回报递增，更强化了教师培训制度的行政化路径依赖。最后，高等教育是高度复杂系统，教师培训绩效难以观察或直接度量，从教师培训到高等教育质量这条因果链条包含了无数模糊因素，内在的复杂性削弱了透明度，提高了“交易成本”，从而使得决策者更倾向于重复之前的行为。

六、结语

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对教师培训工作的绝对领导，才能培育出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也

才能发展高质量的教育。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回顾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依靠三大法宝在高校教师培训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其一，突出政治性。我党高校教师培训始终与民族复兴大业息息相关，任何教师培训的第一原则就是坚持鲜明的政治导向，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高校教师培训工作的根本保证。其二，彰显时代性。我党高校教师培训始终与时俱进，紧随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勇立潮头，以完成一定历史时期民族国家使命为根本目标，同时满足组织需求与教师需求，坚持守正创新。其三，问题导向性。高校教师培训始终坚持从问题出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着眼于提高教师的素质能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高校教师队伍，作为教师发展中心的时代使命，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保障。如今，高校教师培训制度改革也由早期的“摸着石头过河”转向理性探索，所触及的问题由浅入深。要实现新时代教师队伍的高质量发展，更需认清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改变过去追求规模和速度的发展模式，以全面提升质量为重点，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以宏观的历史思维正确认识培训制度变迁对教师观念、态度及偏好的塑造作用，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警惕行动者与制度互动有可能改变制度改革的最初意图，妥善处理制度变革过程的路径依赖等复杂问题。从而使我党始终掌握高校教师发展的历史主动，提高培训制度的系统完备性、科学规范性、运行有效性，营造有利于教师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环境，进而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典范，满怀自信地完成从追赶到超越、从借鉴到自主、从跟跑到领跑世界高等教育的转变。

（李 芒，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北京 100875；石君齐，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原文刊载于《中国大学教学》2021年第8期）